



/社/会/学/研/究/文/库/



孝与养的失衡

——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

高法成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社/会/学/研/究/文/库/



孝与养的失衡

——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

高法成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与养的失衡: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高法成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609-9466-6

I. ①孝… II. ①高… III. ①侗族-村落-老年人-养老-研究-贵州省 IV. ①F323.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7389 号

孝与养的失衡: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

高法成 著

策划编辑:张馨芳

责任编辑:曹红

装帧设计:范翠璇

责任校对:张会军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1.75 插页:1

字数:212千字

版次: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ERFACE

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下江镇的平寨,有 90 多位老人,平均年龄 72 岁,既是平寨传统社会的基础力量,也是平寨老年型社区的基础力量;老人们既经历了一穷二白、艰苦奋斗的生活岁月,也走进了美好的新时代,只是临近的夕阳红并没有让他们可以轻松地享受晚年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性的追求更多地表现为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于是父代开始逐渐将权威让渡给拥有经济实力的子代,越来越迁就子女的安排,比如养老时居住状态和供养方式,都是循着有利于子女外出务工的路线来做合理的安排。这也就引起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秩序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以子代为要的因素越来越显示强大的力量,引领秩序的变动、运转。

社会养老已经成为当今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补充,客观上平寨的老年人也出现了对社会养老的需求。但平寨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我养崽,崽养我”是代际间最基本的互惠法则,当前的老人不会真的选择进养老院生活,那样会“没面子”。就是年轻人预想的将来养老,也是要跟儿子过,其次是自己老了单过,顶多买点社会养老保险什么的,进养老院是行不通的。

人口流动带给平寨最大的成绩当然是经济收入的快速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但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人口流动也为平寨老年人的养老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子女的流出,使得老年人的照料受到很大影响;

子女因务工带来的收入,改变了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地位,老人权威随之下降,渐渐失去了对家庭的主导权,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变化;子女常年外出务工,家里农活又全部落在老人的肩上,同时还要照顾孙辈。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不用怀疑的,不养老人一直未在平寨发生过,而养却没有真正地实现:无论对子女还是老人,子女既没有在老人身边照料,老人也没有休息下来颐养天年。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可秩序所规范的子女对父母的孝与子女对父母的养却因人口流动与代际关系变化而出现了失衡。如果子女能够借助社会养老的功能,转移必须对父母的照料,这一失衡会很快平复,但会引起家庭养老秩序的变化。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在平寨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是由建立在代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孝文化来规范、运行的。血亲价值构成的代际关系永恒性地表达着;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一对互等的孝行。尽管平寨的子代长期外出务工,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寨子里,回到父母的身边。平寨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尽管不时有外来文化的元素进入平寨人的生活,但并不能改变寨民“儿子养老”的固执观念。建构孝文化的代际关系基础不被改变,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就会稳定地运行着。

平寨当前所形成的孝与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遵守单系偏重的互惠和内化了的传统习惯,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抚养与赡养的反馈模式,并据此规范、处理着孝与养的各种问题。孝文化依然是平寨的道德传统,“我养崽,崽养我”是孝文化最朴素的理念认识;“寨子从来没发生过不养老的事”是孝文化最朴素的实践认识。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了养——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老人——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给口饭吃,平寨的养也朝向“生活照料、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着。在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中,父母与子女是秩序的主体,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以血亲为基础构成的父母对子女抚育的亲子关系,嬗变为子女成年后对衰老的父母赡养的孝养关系,这正是代际互惠的反馈模式,这成为建立在亲子关系和道德伦理之上的主体行为。那么,为保证主体行为符合养老秩序的安排与运行,家庭财产继承与养老责任的单系偏重、入土为安与儿女双全的内在习惯,则构成了社会主体的行为机制,保证孝与养的有序运转。

正是在这套严密的秩序下,平寨的家庭养老尽管遇到了人口流动与代际关系的冲击,却没有让位于社会养老,客观上还有三个条件支撑着这个秩序稳定地运行着:第一,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根本的需求是要保证老人“老有所养”。平寨人因为观念上的固执和经济能力的限制,仍然追求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应该引起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第二,视乡土为生命根本的平寨人,外出务工并不是一辈子的生活轨迹,最终还是要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走完这一生。第三,随着整个贵州大环境的变化,以旅游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已经淡化了的侗族传统文化重新找到了复原的力量。传统的家庭养老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应该是加强主体行为及行为机制的稳定与运行,而不是打破主体互动的关系去建立新的秩序。

目 录

CONTENTS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1
一、社会现实与个人的感受	1
二、研究的学术与理论预期	3
第二节 研究回顾	7
一、孝文化与家庭养老	7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	11
三、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养老问题的研究	13
四、代际关系与中国农村养老的研究	18
第三节 关键术语、技术路径与研究方法	20
一、关于社会秩序	20
二、关于孝与养	26
三、技术路径	30
四、研究方法	31
第一章 田野点概述	34
第一节 平寨的自然与生计	36
一、依山傍水,交通便利	36
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7
第二节 平寨的社会状况	39
一、寨民记忆中的村寨历史	40
二、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	42
第三节 平寨的传统文化	44
一、传统习俗	45
二、尊老敬老的孝文化	47

第二章 流动视角下的平寨老年人	50
第一节 平寨的老年人口	51
一、老年人口分析	52
二、家庭与老年人口	55
第二节 平寨人口流动对老年人的影响	58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	59
二、留守老人的生活	60
第三节 平寨的老年人问题	62
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低	62
二、老年人的“儿子养老”观念	65
第三章 平寨孝与养的传统秩序	67
第一节 两则孝以立人的故事	69
一、村长的三个“母亲”	69
二、甘于奉献的巾帼	70
三、家庭养老的传统	72
第二节 平寨家庭养老的分类	74
一、共居供养	75
二、轮居供养	76
三、独居供养	77
四、独居自养	77
第三节 单系互惠的家庭养老秩序	78
一、抚幼与养老	79
二、女儿与局外人	80
三、互惠的代际	82
第四章 平寨家庭养老秩序遭遇的压力	85
第一节 家庭成员关系对养老的影响	86
一、婆媳不和，外出打工反成“润滑剂”	87
二、老人独立，第三代面对的养老困惑	88
三、兄成弟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	89
第二节 依靠儿子养老的种种无奈	90
一、没儿子养老难	91
二、儿子多了也未必都是福	93
三、家庭养老秩序的传统维系力量	94
第三节 当赚钱成为最重要的事	96

一、留守,老年人遇到的新“课题”	96
二、当赚钱成为改变贫穷的重要手段	98
第五章 平寨对社会养老的认识与拒绝	101
第一节 人口转变视角下社会养老的需求	103
一、家庭对养老支持的弱化	104
二、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潜在需求	106
三、生活追求质量与为养老储蓄	107
第二节 文化传播视角下孝文化的转型	108
一、孝文化的衰落与养老	109
二、老人对精神慰藉的需求	112
三、平寨孝文化的新内容	114
第三节 社会养老在平寨的“认”与“拒”	116
一、平寨对社会养老的认识	117
二、社会养老在平寨还是遥远的事	119
第六章 孝与养的失衡:人口流动与代际关系的冲击	122
第一节 人口流动带给养老的“副作用”	124
一、老人下降的权威与生产困境	126
二、年轻一代不愿预测自己的养老生活	128
第二节 代际关系下传统家庭养老秩序的维持	129
一、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传统的力量	131
二、“儿子养老”与“落叶归根”	132
三、以代际关系为基石的孝文化	134
第七章 社会秩序理念下对平寨孝与养的再思考	137
第一节 平寨社会秩序所形塑的孝与养	139
一、孝与养的血缘基础——社会主体的亲子关系	139
二、孝与养的亲子基础与反馈模式	
——道德伦理的主体行为	141
三、孝与养的单系偏重与内在习惯	
——传统演进的行为机制	143
第二节 社会秩序对孝与养失衡的规范力量	146
一、由家庭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博弈	148

二、代际中的亲情与流动最终的回家	151
三、侗族传统文化在平寨的淡化与复兴	152
结语	156
附录	163
参考文献	167
后记	178

导论

INTRODUCTION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养老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并各有感受的个人问题。而这又是一个家庭结构得以在稳定中进行变动的重要影响因子,是人类世代绵延的合理回报与归宿。在当前经济发展为先、社会道德出现缺位的社会风气中,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又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是关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现实与个人的感受

200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超过了国际人口老龄化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7%),表明我国已经快速地进入老年社会。如果仅是进入老年社会,带来的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这其中更为世人所担忧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孝道为文化传统的国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孝成了重大的经济负担。学者李日邦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已超过发达国家的程度,而经济水平则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

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2004年以后的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李本公直接指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挑战就是怎样解决养老问题。

《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44亿（2005年底数据），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即农村老年人口总量超过了8000万。现阶段我国农村既面临原有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存量问题），又面临新增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增量问题）。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加上农村青壮年人口外迁频繁，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将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正因为此，在养老问题上，农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

在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农村最先冲击的就是父母与子女间的经济关系。一直以来，在农村，父母代表着家庭的一切，子女依附于父母，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形成了父代掌控家庭经济权，并决定如何传于子代，以此维系着一个家庭、家族，甚至一个村落。改革开放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劳动力的缺乏也迅速显现出来，于是农民进城出卖劳力、当建筑工人，成为后来所谓的“农民工”的先遣队。这引致的经济变化就是，距离城市近、交通方便的农村率先发展起来，搭上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列车”。富裕的农民开始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也包括子女的婚姻条件。但富裕的农村在金钱陡然来临之际，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攀比之风大行其道。而另一政策的严格执行，让这些来之较易的金钱也渐渐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家庭关系。计划生育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推行，尽管这一政策分地区、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将其理解成“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农村因上千年的农耕结构，摆脱不了依靠男性劳动力来保障家庭收入的稳定与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又因婚姻关系——男娶女嫁的形式，使得家中的女儿长大后就成为别人家的劳动力，计划生育一开始在农村就凸显了“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生个男孩是女性嫁进夫家后最大的责任。农村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与子女数量的不断下降，造成子代在家庭关系中的位置不断上移，父代的权威开始被弱化。同时，女性生育功能因“生子为贵”而扭曲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母亲”这个角色往往是家庭的决策者。“男人怕老婆”“爷爷是孙

子”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所面对的社会扭曲现象，子代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即使是女孩，因为只有这一个，也变得相当重要。父代与子代这种地位的变化，最终带来的是老人养老突然变得异常艰难。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弃养老人、虐待老人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一些追求经济独立、个人发展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毫无羞愧感与道德观念地提出不但不会跟老人一起生活，还要求父母在满足子女的生活欲望后去自己独立生活。

生长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一代人，于21世纪初期进入社会拼搏，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人解放与发展，“宝马雕车香满路”也不过如此。但在发展了的同时，许多人却忘记了感恩，忘记了曾经的苦难历程，忘记了高速发展之路是由父辈铁一般的脊梁硬扛起来的，更忘记了父母为子女所牺牲的一切。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如果只看家庭中的父代与子代的关系，就可切实感受到中国传统孝文化、尊老观念的步步沦丧。

二、研究的学术与理论预期

仅从个人的情感上去看待传统的孝与养，认识难免失之偏颇，难以认清事物的本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一问题如果被忽视，社会秩序将失去稳定运行的基础。2010年11月7日，《工人日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如果您没有急事，建议您乘坐62路普通公交车。”11月3日，在吉林省医院门前，当一位小伙子试图登上该线路“老弱病残孕幼”专乘时，遇到乘务员温和劝阻。从10月29日起，长春市有两辆62路公交车以“特殊身份”上线运营——“老弱病残孕幼”专乘。对于国内公交系统的这一新生事物，市民拍手叫好者有之，批评质疑者亦有之，两派甚至在当地媒体上打起了“口水战”。“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该专乘车的创意人、62路车队队长黄景辉说。

的确，“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前几年各地探讨的老年人晨练与年轻人上班同时挤公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引起太久的关注，就被湮没在经济大发展的其他问题之中。今天，在追求社会公平时，老年人的资源使用却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而且这反响中似乎质疑的声音更多。其中的原因到底为何？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社会事实角度讲，老人使用社会资源都应该是社会大力支持并应努力为之提供的，这表明一个社会文明发展、

进步的程度。可一旦社会提供了相应资源与权利，却立刻引致讨论甚至质疑。难道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是看似回到原点的螺旋循环？在远古时期，完全依靠体力生存的时代，老人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负担，要消耗有限的资源却无法创造新的价值，对老人限制资源消耗是可以理解的。而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资源极其丰富，老人所使用的各种资源正是他们曾经辛苦付出积累而得到的，那为什么出现专门针对老人的服务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如果不从学术的角度加以认真探讨、研究，这必然为今后的老年资源提供造成更大的阻碍，会出现老年人“被抛弃”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于学军曾在《人口老龄化专业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同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主要的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龄化上，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但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一日益严峻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部分地区进入老年型人口状态。特别是从1993年起，上海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学界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加速。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往往是从宏观的数据出发，描述人口老龄化的整体现状，预测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国家整体发展的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尽管有很多研究触及个性化的群体问题，如在家庭核心化发展下的老年人口的照料问题，城市老年人口生活、医疗、医疗保障问题，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甚至有一批学者在探讨孝文化与养老的关系，但这些仍不足以表达老年人的个体性问题，比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老人对子女情感上的依赖到底如何实现，比如仅从法律上寻找子女对弃养老人的经济支持是否能解决问题，比如社会如何为老年人参与社会、追求有质量的生活提供可靠而有效的服务，等等。仅从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上看，不可否认，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发展基础之上的整体效用，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民与工人，将自己的青春与热情贡献给国家的时候无怨无悔，而现在，他们的晚年却面临许多风险，其中农村老年人成为社会保障程度最低的一个群体。

人类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深度挖掘个案中的社会文化的组织与结构因素，个体在社会中的功能价值、文化在个体与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成为人们能够深刻理解社会文化的方法与工具。而在研究人口问题中，许多人口学者越来越多地借助人類学的理论与方法，更加清晰地了解人口现象背

后所反映的社会事实。正如致力于融合人类学与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人口问题的美国研究者 Laura Bernardi 所说,“人类学与人口学有着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那就是人类人口问题,在这一研究中形成互利互补的关系:人口学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为人口的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变动提供支持,而人类学则通过对文化的、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的考察,来研究人类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人类人口学研究领域涉及文化、性别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在方法上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处理原始数据,利用田野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研究法来处理二手数据和历史材料,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下和过去的人口问题中的人口变化过程,特别是生育、迁移和死亡。针对老年人口问题,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个案还比较少,现有的研究多数是从人口学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老龄化社会来临后的制度安排、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的合理化。本项研究借助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法,以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老年人口为研究对象,关注因代际关系的变化与人口的流动对社会养老造成的重要影响,借助文化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从人口流动入手考察人口转变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从而系统深入地了解侗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潘光旦先生把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归结为双向抚育模式,即“甲代↔乙代↔丙代↔丁代”的模式。^① 费孝通先生则将这种模式进一步阐释为“反馈”模式,以区别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抚育幼儿、赡养老人是一切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采取反馈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②。在人类学看来,代际关系是反馈式家庭养老的秩序支持与保障。但今天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与观念中男性资源的稀缺性对代际关系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代际的重心开始下移,尤其在隔代关系上更是如此。

有研究认为,文化、家庭成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在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家庭成员提供养老的意愿,这五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最终导致养老体系的变化。贫困农村家庭的养老问题仍然主要依赖子女数量,农村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和迁移,使得因计划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现的老人供养和照料资源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重。流动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家庭养老所赖以存在的

① 潘光旦. 潘光旦文集(第一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357.

②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重要条件——紧密的血缘联系。首要的影响是，地理间隔使得农村老人从儿孙方面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变得很不现实。虽然外出务工有可能提高对老人在经济和物质上的供养能力，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外出青年受消费主义影响，“挣钱不够自己花”“从不顾家，还向父母要钱”的情况同样大量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公民化”过程的开启将会导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亲子关系的紧密性和相互依赖性也会减弱，人们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认同程度由此会随之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① 有学者甚至发现，农村代际关系甚至表现为年轻人结婚时“剥削”父母，父母为自己养老而保留私蓄。^② 人口的流动性加强，造成今天的父代一旦步入年老的行列，尤其是失去劳动能力、开始需要子代的照料时，却发现身边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孩子——子代外出务工比起照料父代的功能还要重要。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加大劳动力外移的范围和速度。据贵州省统计局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5年贵州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总数高达890万人。这一数据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一倍多。在流出省外的630万人中，有87.3%流向了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在贵州省外流人口中，97.85%从农村流出。对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养老保障措施极不完善，家庭养老是目前可行的养老方式，劳动力外移必然会对农村家庭的养老意愿产生影响。^③ 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工业化生产，农村老年人在生产劳动中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家庭成员对老人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同时，受生育率下降和老年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预期寿命也在延长，少数民族老年人口在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社会经济条件上来说，对西部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口难以普遍实行优先照顾、优厚待遇的政策；在外来文化的作用下，一些传统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原先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由于掌握经验而占据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传统习俗以及宗教教义中关于尊老敬老的规定往往被忽视或遗忘。受到代际关系变动和

①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 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 [J].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1).

② 贺雪峰. 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 [J]. 社会科学研究，2009(5).

③ 聂焱. 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析 [J]. 贵州民族研究，2008(1).

人口流动影响的西部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意从代际关系与人口流动这两个视角,深入考察一个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从而为人们重新理解、准确把握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养老秩序提供一个详细的案例,这一田野调查也是人类学理论与人口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二节 研究回顾

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有媒体将医疗、教育、养老和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称为新的“四座大山”。城市人口的养老问题最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源于城市资源的优先性,传统的“养儿防老”和基于社会保障与市场行为的自我养老、社会养老在城市正形成多元化格局。但由于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差别,养老问题在城市与农村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发展局面。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府普遍难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主要依靠家庭中的代际交换,依靠下一代的资源转移。而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人口老龄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等均被学术界认为是影响老年人养老体系的重要因素。

一、孝文化与家庭养老

尊老敬老是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文明行为,而孝文化则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孔子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伦理基础,并贯穿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有人甚至表示儒家文化就是孝文化,就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杨国枢,1988)。“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肖群忠,2002)。许多研究者从伦理学角度发掘孝及孝文化的内涵。肖群忠认为孝道主要是由爱心、敬意、忠德和顺行构成的,爱、敬、忠、顺是孝道的伦理精神实质。郑晓江认为孝的伦理内蕴有三个方面:奉养长辈、顺从长辈、祭祀先辈。侯欣